

中西对话
汪琪 主编

当代西方 思想的困局

劳思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西对话
汪琪 主编

当代西方 思想的困局

劳思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思想的困局/劳思光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中西对话)

ISBN 978 - 7 - 5675 - 4660 - 8

I. ①当… II. ①劳… III. ①哲学思潮—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①B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742 号

中西对话 当代西方思想的困局

著 者 劳思光
策划编辑 王 熠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吴飞燕
责任校对 陈美丽
装帧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苏州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4660 - 8/B · 997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王 熠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丛 书 序

清末民初的百年间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典范转变后，逐渐陷入一个所谓的“双重边缘化”困境。在理论知识上忠实追随西方，不仅使我们在国际学术版图上沦为边缘，研究对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也颇为有限。华人社会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年复一年投入庞大人力与资源，追求国际竞争力，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意义？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西方、重建“主体性”，又如何能在学术上与西方对话？

许多人急于提出“本土理论”，然而理论知识的产生必须由更根本处着手。无论是对西方论述的回应或评论、由现代学术的观点诠释传统、检视中西思想交流，或直接面对本土学术议题，系列丛书的目的都在以一种较一般“本土化”论述视野更为宽广的思维，来推展本土学术可长可久的发展。

导 读

陈振昆(台湾华梵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劳思光先生一生以《中国哲学史》闻名于世,但实际上劳先生的文化志业与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中国哲学史》的局限。刘国英教授尊称劳先生是“当代中国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家”。他强调劳先生不是以弘扬国学的民族主义心态来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而是“从理论效力的高度,来分析、判别与评估中国思想家在哲学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再者,劳先生在《历史的惩罚》中以一种动态的历史观对中国文化进行考察,也就是用一种开放性的态度而不是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封闭方式来看待中国文化。劳先生秉持康德批判哲学的精神,力主中国哲学通往世界哲学的发展,努力发掘传统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成素,使之成为能面对当前世界文化问题的思想资源,让中国哲学成为一种能继续发挥功能的哲学。^① 沈清松教授并认为劳先生晚年之所以契合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的文化哲学,是因为哈贝马斯构思了一个

① 参阅刘国英《当代中国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家》,收入王隆升编《劳思光教授纪念特辑》,《国文天地》月刊第28卷第8期,2013年1月,第36—39页。

足以促进人类理性健全发展的完善计划,并把第二次的启蒙运动扩大到能够涵盖人类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s)的生活世界。劳先生珍视哈贝马斯哲学坚持人类理性以对抗后现代的反理性主义的勇气(可称之为“理性的希望”(hope of reason)),并且透过理性的两个功能:“批判”(the critical)和“建构”(the constructive),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互相丰富中获益,让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共同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沈青松教授推崇劳先生面对中国与世界文化危机的宏伟视野。^①

劳思光先生本名荣玮,号韦斋,思光是先生的笔名。先生本籍湖南长沙,192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46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1955年因办报论政,不容于戒严政府而离台赴港,先后任教于珠海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两度赴美为访问学人(哈佛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1969—1970)、普林斯顿大学(1975—1976));1985年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后转任原校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逸夫书院高级导师(1986—1997)。1989年台湾解严,劳先生返台任教于清华、师大、政大^②与东吴等校客席;1994年起受聘于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与哲学系讲座教授,直至2012年10月辞世为止。

劳思光先生出身翰林世家:高祖父崇光公官拜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祖父启恂公曾任陕西鄜州知府;父亲竞九先生,中将军阶退伍,曾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辛亥革命。劳先生幼承家学,加以天资聪颖,七岁即擅诗能

^① 参阅沈青松(Vincent Shen)教授在第18届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纽约大学水牛城校区,2013年7月21—24日)所发表的英文论文《在劳思光与唐力权哲学中的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 in Sze-Kwang Lao and Lik-Keung Tong's Philosophies)。

^② 清华指位于新竹的台湾清华大学,师大指台湾师范大学,政大指位于台北市的政治大学。

文,从此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① 劳先生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失效,而现代文化建设尚未就绪的迷乱时代,不得不询问“中国的路向为何?”、“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问题。劳先生在二十岁,也即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前后,即开始关心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危机与哲学危机问题。为文化危机与哲学危机寻求解决困境的可能途径,便成为劳先生一生尔后约六十五年学术岁月的研究旨趣所在。晚年劳先生的学术生活更聚焦于建立一个足以解决当代文化与哲学困局的文化哲学,并为之奠定理论基础。

劳先生把他个人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②:

早期:主要包括 1958 年以前发表的著作,此时期的论著主要发表于《民主潮》,旁及《祖国周刊》、《民主评论》、《大学生活》、《自由学人》等杂志,最后被集结为“思光少作集”七册(1986—1987)^③。此时期劳先生的思想的主轴主要采用“黑格尔模型”(Hegelian model)来探求中国儒学的新出路,并旁及对西方传统与近现代哲学的融摄。

劳先生的早期思想,关心中国现实的政治情势与历史文化发展,探究中西哲学思想潮流,勤于著述立说并撰写时文政论,并不局限于专业的哲学理论建构工作。劳先生忧心于西潮东渐下的苦难中国在丧权辱

① 劳先生一生除发表一系列的哲学文化学术著作与撰写文化政治评论文章之外,亦擅长写作古典诗词以寄托感时家国之怀。华梵大学中文系邀集校内外师长合组“韦斋诗会”读书会,编纂成《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一书,述解诗词 250 余首,由王隆升教授主编,2012 年由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

② 参阅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中“自序”部分。

③ “思光少作集”七册为:《儒学精神与世界文化路向》、《哲学与历史》、《哲学与政治》、《知己与知彼》、《远虑与近忧》、《西方思想浅谈》、《书简与杂记》,由台湾时报文化于 1986 至 1987 年出版。

国与风雨飘摇中彷徨挣扎的现实处境与历史困境，故有大量的政治社会文化评论发表，都被编辑在《少作集》的合集里。

此时期的劳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不管是专书或论文，都发表得比较少，相反，他对于西方哲学下了不少的工夫，举凡康德、黑格尔、科灵乌、拉斯基、密尔、卡西勒、海叶克、齐克果、许怀恻、汤恩比、石里克、刘易斯、阿德利希、魏思曼、怀德海等哲学家，他都有所涉猎且有论文发表，并有后来《哲学问题源流论》(1956—1957)、《康德知识论要义》(1957)、《思想方法五讲》(1958)、《存在主义哲学》(1959)等重要哲学专书的出版。

这时期的劳先生对于康德哲学与黑格尔文化哲学主要采取“主体性”的思想架构，用来作为诠释儒学的心性之学与道德修养论以及评论中西文化问题的理论模型。康德的主体性是“自由意志”，黑格尔的主体性是“绝对精神”，劳先生的主体性应该也是比较接近于康德的儒家孟子心学的“良知”、“本心”等自觉意识。^① 劳先生在这里采取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思想形式是由“主观精神”(心)向“客观精神”(物)开展的“外在化”(externalization)活动过程。这也就是“文化精神”客观化落实为“文化现象”的活动过程。这个“主体性”与“外在化”的理论模型的形式使用，一直延续到劳先生中期思想期间，撰写《中国哲学史》时，作为评判中国哲学史发展中各家各派哲学理论得失的主要判准。至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辩证法”方法论与存有论体系，并不被劳先生所青睐。

中期：作品约略包括 1955 年到 1980 年代劳先生离台留港期间所发

^① 因此要理解劳先生的早期思想方法，《康德知识论要义》、《思想方法五讲》是最重要的著作。

表的专书、论文,后经收录、编校与重刊为“思光学术论著新编”十三册(1998—2001)^①,以及《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册行世。此时期劳先生的思想主轴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阐释”与“西方现代及当代哲学思想的清理”。前者,最具体的成果便是《中国哲学史》在“世界哲学”的学术视野与“基源问题研究法”的哲学史方法论方面都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典范;后者,主要是劳先生渐渐走出黑格尔文化观的局限,进而消化吸收西方现代哲学与当代哲学思想,从文化哲学到文化科学、从英美哲学到欧陆哲学的酝酿过程。这成为劳先生从早期向晚期思想转变发展的过渡时期。

劳先生渐渐了解到黑格尔的“主体性”与“外在化”文化哲学的模型,如果只就一个文化的内部发展来看,则此一模型的理论效力即已足够。但若是涉及多数的异质文化并立而交互影响的跨文化领域,则显得不够适用。特别像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危机问题,便都是由外来异质文化的压迫所产生,此时若只使用黑格尔模型来讨论问题,便显得局限。因此,劳先生引进帕森斯模式(Parsonian model)来弥补黑格尔模式的不足。相反于黑格尔“由内而外”,文化科学家帕森斯的“功能结构主义”以外在经验生活世界为原出,再“由外而内”内在化(internalization)为内在的价值意识世界。如此便结合成“双重结构的文化观”:一方面由自觉性或文化意识为根本,从此由文化精神衍生文化生活的外化结构;一方面由“社会性的实有”(social reality)为根源,由经验世界形成文化意识的

① “思光学术论著新编”十三册为:《中国文化要义新编》、《存在主义哲学新编》、《思想方法五讲新编》、《哲学浅说新编》、《历史之惩罚新编》、《中国之路向新编》、《文化问题论集新编》、《大学中庸译注新编》、《康德知识论要义新编》、《哲学问题源流录》、《自由、民主与文化创生》、《思光人物论集》、《家国天下——思光时论文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内化结构。劳先生在这里不局限于黑格尔理论模型而走出意识哲学局限的转变,加上尔后对于康德批判知识论的坚持,与放弃大系统哲学的企图,让他渐渐地与当代新儒学的哲学思维渐行渐远。

再者,劳先生 1969 年赴美访问,让他在英美哲学的学识上大有长进。他对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当代意义理论本已有所把握,与蒯因教授(W. V. O. Quine)以及维也纳学派费格尔教授(H. Feigl)的对话,使劳先生对于维也纳学派卡那普(R. Carnap)物理主义的立论与用心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解。劳先生在美国接触哲学界人士既多,又觉察到二次大战后西方哲学思想之演变有越来越复杂的倾向,终于认识到分析哲学虽然能提供严密思考的训练,但却逐步失去欧美哲学的主流地位。这也就影响到劳先生开始转为注意欧洲德语哲学的发展情况。^①

晚期:自 1980 年代至今,已出版的专书或论集十分丰富,包括:《中国出路问题的新检讨》(1993)、《思辩录——思光近作集》(1996)、《文化哲学讲演录》(2002)、《虚境与希望——论当代哲学与文化》(2003)、《危机世界与新希望世纪——再论当代哲学与文化》(2007)。此时期劳先生的思想主轴在于直接面对哲学与文化危机,全心致力于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其具体思想成果,依据张善颖先生《劳思光哲学:一个综览》一文之分析,可以区分为四个领域:(1)“中国文化路向的检讨”;(2)“中国哲学的特性及其未来”;(3)“文化危机之克服”;(4)“哲学危机之超越”。^② 劳先生

^① 参阅劳思光《思辩录——思光近作集》之“自序”第 2—3 页,此书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6 年出版。

^② 该文编入张善颖《劳思光哲学要义——超越中国哲学史》(*Understanding Lao Sze-Kwang: Beyond the Crisis of Culture and Philosophy*),由台湾 EHGBooks 微出版公司 2013 年出版。

以前述“双重结构的文化观”取代原先所持守的黑格尔模型，重新检讨中国文化的路向问题。他还提出“结构与历程”、“创生与模拟”两对理论区分，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应该属于一个跨文化之间动态的仿真历程，而不是经由文化精神层面上观念的改造来重现一个内在的文化创生过程。^① 劳先生进而以“批判意识”与“建设意识”两种文化意识，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转型的发展过程。最后，劳先生表现出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片断地受到后现代文化的观念影响，反对理性、否定规范规则、否定现代文化、混淆了前现代与后现代等乱象非常忧心。他对于后现代文化的知识片断化、理论的自我矛盾（一方面宣称“反对理论建构”，一方面又有所理论宣称）、陷入社会秩序的虚幻化、价值的相对性等问题都提出批判。^②

在《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册完成（1981年）之后，劳先生在一系列的论述与讲演中所提出的重要观念，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的研究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启发，例如“在世界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world）之学术视野、“开放成素”（open elements）与“封闭成素”（close elements）的分辨、“引导性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与“认知性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的区分等。^③ 再者，劳先生努力阐发了传统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视域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价值之精彩所在，例如：儒学的德性工

① 参阅《中国文化路向问题的新检讨》第52—55页。

② 参阅《远景与虚境：论中国现代化问题与后现代思潮》，见劳思光著、刘国英编《虚境与希望——论当代哲学与文化》，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 劳先生认为中国儒释道哲学之企求“成圣”、“成佛”，属于“引导性哲学”，目标在寻求“自我转化或社会转化”，故可以在道德哲学（心性哲学）或政治社会哲学领域发挥中国哲学思维的“开放成素”而有所贡献于“世界哲学”的建构。

夫论在“主体性”(subjectivity)与“实践”(praxis)性质中可能的开展,以及道家哲学可向“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与“主体性之解消”开放的理论可能性等,都让中国哲学具有现代世界哲学的理论意义。至于西方哲学方面,欧洲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与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①的诠释学,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语言哲学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等当代欧洲重要哲学理论都为劳先生所探索而融摄。特别是哈贝马斯哲学中的普遍语用学、交互主体性、对话伦理学、沟通理性、事实与规范的分判,以及后形而上学思维(超脱实体性或主体性哲学的思维)的程序合理性,成为劳先生晚期建构文化哲学理论最为重视的哲学思维。

对于以上劳先生的晚期思想,也就是完成《中国哲学史》之后思想发展转向的历程,以及所开展论域的新格局,进行一番全盘性的轮廓描绘有其必要。劳先生晚期思想的进展,特别是最后几年为文化哲学理论奠基的探讨用心所在,可以从解放意识与建设意识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从解放意识这方面来看,本书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劳先生对于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的分析与批判,便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最好的代表作;至于从建设意识方面来看,则劳先生晚年对于哈贝马斯哲学持续的消化与吸收,虽然未能亲自写作成书,我们仍能期待从丰富的上课讲演记录中去整理出劳先生的想法与洞见所在。

走笔至此,笔者诚挚地邀请读者,特别是对于中西哲学思想已经具有基础的读者,亲自领略劳先生的犀利剖析、深邃思维以及其议论风采。

^① 又译作“伽达默尔”。——编者注

读者可以进而参酌学人研讨劳先生哲学文化思想的成果^①。虽然本书的撰写,因着劳先生的离世而未有结论,但在劳先生的相关著作中,读者当能体会劳先生突破文化危机与哲学危机、建构文化哲学的宏图伟志。

① 《无涯理境——劳思光先生的学问与思想》(1997);《劳思光思想与中国哲学世界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万户千门任卷舒——劳思光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2007);《劳思光思想与当代哲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劳思光教授逝世周年“劳思光思想图谱”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

目 录

从书序	1
导读	1
编者后记	1
第一章	
引言——待解的难题	1
第一节 从“希望的世纪”到三重困局	2
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性：第一重困局	6
第三节 现代文化与不完整的计划(Incomplete Project)：第二重困局	16
第四节 反理性思潮与“哲学之终结”(End of Philosophy)：第三重困局	34
第二章	
诠释学风之收获及迷失	42

第一节	客观主义之争议·····	43
第二节	诠释学风与相对主义·····	52
第三节	外加结构与文化世界·····	60
第四节	反省思维之新向度·····	75

第三章

反理性思潮之检评与理性言谈之转向·····	95
-----------------------	----

第一节	后现代思潮之历史背景·····	95
第二节	后现代思维的家族相似性·····	102
第三节	后现代思想之理论重点·····	113
第四节	“反理性”(anti-rational)论述而非“非理性” (irrational)论述·····	159

第四章

异质文化之问题·····	162
--------------	-----

第一节	引言——冲突(conflict)与整合 (integration)·····	162
第二节	三种通俗观念(demotic ideas)·····	167
第三节	典范转移与破除迷执之尝试·····	174

结论

勇敢承担历史之任务——观念之探险·····	210
-----------------------	-----

第 一 章

引言——待解的难题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真正关心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哲学的困局、其可能的出路,同时也是一个所谓文化危机的问题。我们对于文化的前景、功能等等的认知,都处于一个朦胧不清的阶段。我个人的研究工作,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哲学和文化的危机,清理这些基本的问题,来看看我们有什么希望,能够透露什么样“可信的”(reliable)希望。我的工作是基于这样一个“旨趣”(interest)。多年来,我的工作常被人误会;解释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最早我是以康德之后“知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①所产生的对于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开始的。我也曾经运用“黑格尔主义”(Hegelianism)的模型,因为他是从康德之后影响欧洲的,取的是比较“正面”(positive)主张的方式。但我认为我们要有大格局的眼光和胸襟去承担面对文化危机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很长远历史与悠久文化的国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不论我们赞成多少,反对多少,都需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进入中年之后,我开始整理中国哲学,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因为这本书比较流行,所以很多人通过这本书来看我。在很多场合,特别是我 50 岁前后,走到任何场合,大家都介绍

^① 又译作“认识论转向”。——编者注

说我是整理中国哲学、寻求中国哲学新出路的代表人物。因此在 50 岁到 60 岁左右,我就声明:中国哲学的整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个工作做完了;我计划的下一步是清理 20 世纪的哲学问题,也就是“当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思想的清理。事实上,从 60 岁到现在的 20 年来,我确实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现代文化之下哲学思维的演变,以及演变有什么样的成果、困难。

第一节 从“希望的世纪”到三重困局

看世界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哲学的危机,可以从西方史学家对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看法开始。韦尔斯(H. G. Wells, 1866—1946)^①在《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回顾 19 世纪时^②,将 19 世纪称作“希望的世纪”(century of hope),因为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都认为世界与文化生活永远在进步当中。进步的观念成为一种自然的观念。文化表现在经验科学的发展、经济秩序的改变或种种社会理想的宣传。各种主张的冲突虽然很多,但都有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好。韦尔斯说这句话是在 20 世纪初期,由历史的演进可以看出当时他的看法正渐渐地在被应验,因此所谓“明天会更好”这种想法在 19 世纪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学院方面。历史演变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种种问题越来越复杂,原先充满希望的世界,渐渐走向处处是“困局”(predicament)的世界,“希望的世纪”这种信

① 又译作“威尔斯”。——编者注

②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Garden City: Garden City Books, 1949).